

# 清代浙江省政区边界的格局构建与空间类型研究

施 剑

(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政区边界作为政区的基本要素之一, 其格局之构建直接有赖于政区边界关系之历史沿革, 以及政区辖地划拨等因素。有清一代, 浙江省辖境之内并未发生规模较大的行政区域的划拨调整, 其与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等省交界区域之间亦未见有明显的辖地分割与交换, 政区等级的升格降级、县名更改等成为政区体系整顿的主要策略, 各级行政区域总体继承明制, 变迁甚微, 呈现较为稳定的局面。浙江各级政区界线通过历史时期不断的积累与调适, 及至清代已开始凸显出较为成熟的空间地理特征。以界线的地理形态而论, 清代浙江省各级政区界线表现出以海(海岛或洋面)、山(山岭或山系)、水(江河湖溪塘等)、普通聚落点(村庄与市镇等)为界的四大空间类型, 而这无疑是浙江空间地理基础与人为政治过程不断互动融合的结果, 也构成边界要素所处区域“地理特性”的重要象征。

**【关键词】**清代; 浙江; 政区边界; 格局; 类型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6)03-0033-11

政区边界与幅员、形状、区域和位置等一并构成了政区本身的基本要素, 其中又以幅员、边界两要素最为重要。<sup>[1]</sup> 针对边界要素的专题研究, 属于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中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建国以来, 许是受有关边界线资料的有限性、学术研究旨趣及观念意识等方面的制约, 行政区划边界线的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相对于地理学以及历史政区地理的其他方面研究, 边界研究之边疆国界问题持续兴盛, 而致力于内地传统时期政区边界问题, 特别是直接以浙江省各级政区边界为研究对象的专题学术探讨则显得尤为不足。依笔者管窥, 仅谭其骧、周振鹤、冯贤亮、徐建平等少数学者前后参与了此项研究,<sup>①</sup>其中代表性的成果如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八册之篇幅, 总体复原了各个标准年代的中国历史疆域与政区, 其中明清浙江省各级政区边界复原至统县政区级, 图幅之中蕴含了丰富的政区边界研究成果, 为浙江省政区边界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sup>②</sup>谭其骧另有多篇论文直接涉及历史时期浙江政区边界变迁问题, 如《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一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等文, 从区域开发的视角, 探讨了浙江省界确定的历史过程, 虽只是对省界、府界研究的个案示范, 但文中所提倡的有关政区建置、边界形成等一系列的思路、方法与原则(如地方开发与新建政区之间的互动关系说), 对政区边界问题探讨有着广泛的指导性。稍有遗憾的是,《中国历史地图集》图幅对边界线等未能有详细的文字说明, 迄今亦无相关方面的解释性论著出版, 由此也给研究者深入理解各级政区边界线的划定原因以及演变过程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而谭的上述两文也属提纲挈领性的论述, 有关历史时期浙江政区边界格局演变与空间特征的研究仍有待深化。由此, 本文重点复原清代浙江省传统政区边界格局的构建过程, 细致分析浙江省各级政区边界因历史积累、人为调适后所呈现的空间类型、地理特征, 期冀获得特定层级边界运作机制的相关认识, 以进一步充实、拓展历史政区边界专题研究的成果与深度。

## 一、清代浙江省行政区域变迁及其边界格局之构建

收稿日期: 2016-02-25

作者简介: 施 剑(1986 —), 男, 安徽宣城人, 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清代以来浙江省政区边界的格局构建与空间类型研究”(2015N010);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传统政区边界的空间运作模式研究—以清代浙江南沙地方的改属为例”(Z15JC100)

政区边界作为两个政区之间的界线，是组成政区的基本要素之一，由人为划定，也可以由朝廷根据实际的治理需要随时加以调整。因边界问题事关地方政务运作与基层社会控制，所以传统国家一向重视“疆界管理”。雍正帝即曾以“界址不清”不利地方管理为由，谕令各省督抚等详细清查、勘划边界：

周礼称惟王建国，体国经野，孟子亦言仁政必自经界始。疆界所关，诚为至重。从来两省交壤之地，其界址多有不清，云、贵、川、广等处为尤甚。间有一省之内，各州县地界、亦有不清者。每遇命盗等事，则互相推诿。矿厂盐茶等有利之事，则互相争竞，甚非息事宁民之意。各省督抚其共矢公心，详细清查，如与邻省地界有不清者，则两省各委贤员公同勘定。若本省内地界有不清者，即委本省贤员勘定。<sup>[2] 457</sup>

表1 清代浙江省政区体系变动一览

时间	府	直隶州	散州	直隶厅	散厅	县
康熙二十七年	—	—	—	—	—	以宁波府舟山地方置定海县，以宁波府辖原定海县为镇海
雍正八年	—	—	—	—	析温州府乐清县、台州府太平县地置玉环厅	—
乾隆三十八年	—	—	升杭州府海宁县为州	—	—	降湖州府安吉州为县
嘉庆元年	—	—	—	—	—	以温州府玉环厅石塘、石板殿等地还属台州府太平县
嘉庆十六年	—	—	—	—	—	以杭州府海宁州南沙地方割属绍兴府萧山县
道光二十三年	—	—	—	升定海县为直隶厅	—	—
宣统元年	—	—	—	—	以原属宁波府象山县南田岛地方置南田厅	—

注：表据《清实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以及《读史方輿纪要》、雍正《浙江通志》《嘉庆重修一统志》、光绪《清会典事例》《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国史》等制。

边界发生任何的变动可视为政区体系之变动，政区之所对应的空间区域发生变动，也势必会相应引起边界要素的“连锁反应”。可以说，清代浙江政区边界格局之形成与发展，其根由之一即在于基于特定政治原则与地理背景之下的这种“区域调整”与“边界运作”。笔者以为，政区边界格局之构建，无疑是包括政区边界关系之沿袭的，因清承明制，清代政区界域方面的“因袭旧例”，便是直接地因明疆界之旧制，这一点可视为边界的历史积累现象。分疆划界事宜因关涉税收、司法等其他事务，故属

于地方行政的重点，政区的“疆界管理”也是地方官员有效施政的必备技能。<sup>[3]</sup>一般而言，任何较为重大的疆界调整事件皆应载入地方文献而有档可查，但因诸多历史与人为因素的主客观制约，有关边界地带日常的行政运作过程的直接记载显得零星而不成系统，具体研究中试图获得传统时期政区边界管理方面的丰富而连贯的有效信息，似乎存在较大的难度。

现今的政区边界研究，尤其是县级政区边界的研究，虽不能因为传统史料中未见有关界域发生变更的明确记载，从而断定清代政区边界关系没有变化，但从具体的行政区域调整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见于记载的朝廷对行政区域进行的各项划拨、改属、新置等整顿措施，都将牵涉对政区幅员与边界等地域要素的考量。所谓“夫法不一而民巧生，有王者起，同度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sup>[4]</sup>行政区域一旦发生变更，原有界域之变动则不可避免。在本文限定的地域以及典籍所记载的范围内，引起浙江省政区边界变动的重要事由，主要体现于两类：一是政区之改属，即凡改隶其归属关系引起的政区边界变动。如嘉庆年间，杭州府海宁州“南沙”地方的改属绍兴府萧山县；宣统三年至民国初年，象山、南田界域与治所迁徙之争；<sup>[5]</sup>二是政区之析置，即析划旧地、新置州县引起的政区边界变动。如雍正年间析太平县界之楚门、老岸、南塘、北塘、芳杜、东岙、密溪、洞林及温州府乐清县界之磐石、蒲岐、三盘、黄大岙、状元岙、茅埭等处置玉环厅。嘉庆元年，又将玉环厅所属石塘、石板殿等地往属太平县；<sup>[6]</sup>宣统元年六月，于象山县之南田岛置南田厅属宁波府（参见表 1）。

从表 1 所梳理的有关政区变动情形来看，有清一代，浙江与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等省交界区域之间亦未见有明显的辖地分割与交换，省境之内并未发生规模较大的行政区域的划拨调整。政区等第的升格降级、县名更改等成为整顿政区体系的主要策略，各级行政区域总体继承了明制，呈现较为稳定的局面。可以认为，浙江省与周边界邻区域之间基本维持着“固有之境界”。<sup>[7]</sup>即便雍正年间，朝廷对全国各区域的政区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与浙江省北部紧密界邻的江南苏、松、常等府也出现了因粮赋“分繁”而增设县级政区的政区改革高潮，浙江省的政区体系对此也未产生多大的连锁式反应。即便江南分省，形成与江苏、安徽两省交界之局面，这也只是涉及高层政区内部幅员的划分以及新省之间确定界线而已，无关于浙江省界的实际变动。<sup>[8]</sup>同时，其他绝大部分的府、州、县也基本维持了至少自明以来传统的“固有之境界”，表现出较为鲜明的继承性与稳定性。例如台州府宁海县境，崇祯《宁海县志》记载其境界云：

宁邑在郡东北大海上，东西一百九十，南北二百六十五里，是为提封之境，东界象山，西界天台，南界临海，北界奉化，是为四正。东南自牛头洋入临海，西南自溪源入天台，东北自柴溪岭入象山，西北自杉木岭入奉化，是为四隅。……东至象山县界西溪岭一百一十里，东南至牛头洋二百五十里。南至临海县界宁和岭一百一十五里。西南至临海县界桐岩岭一百二十里。西至天台县界白溪源八十里。西北至新昌县界苏木岭九十里。北至奉化县界栅墟岭七十里。东北至象山县界紫溪岭一百二十里。<sup>[9]</sup>

按其辖境，与之存在界邻关系的县，共有象山、天台、临海、新昌、奉化等 5 县，这一界线格局与清代宁海县界的边界完全相同。光绪《宁海县志》在叙述本县疆界之时，详细记载了依据西洋经纬测绘舆图而确定的四至八到之界点，而这些界点也基本与明代宁海县境的“四正”“四隅”之界点保持一致，有的只是因为测绘精度的提高，对处于同一界段之上同一界点的里距进行了校正，以及同一界段之上的不同界点作出了更为明确的选择而已：

东至西溪岭象山界六十九里旧志一百九十里。旧县境图作一百里。赤城志一百三十里。南至分水岭临海界八十四里旧志宁和岭一百一十五里，今宁和只八十二里，因宁和稍偏西南，故用分水岭。西至坐字岩天台、新昌县界六十三里旧志西至天台白溪源八十里。案白溪源出天台华顶东南三十二里入县西境坐字岩之北。北至栅墟岭奉化界四十七里旧志七十里。东南至武曲村入海一百零一里旧志东南牛头洋入海二百五十里，系海程。东北至界岭象山界五十五里旧志东北柴溪岭象山界一百二十里。今界岭在柴溪村东，即旧之柴溪岭也，其稍南有石门岭，亦象山界，距县城五十三里。西南至桐岩岭临海界八十三里旧志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横溪岭奉化界五十七里旧志西北苏木岭新昌界九十里。今苏木岭六十六里，因此岭稍偏西，故用横溪岭。<sup>[10]</sup>

若以明代政区析置而定的界域在清代的沿革来看，“清承明制”的痕迹同样表现显著。据笔者梳理统计，自明洪武十四年后，浙江境内共新置有 11 个县级政区（别无其他层级的政区建置），其分别为：宣德五年三月新置嘉兴府秀水、嘉善、桐乡、平湖

4 县；景泰三年五月分处州府丽水、青田等县设置云和、宣平、景宁 3 县；景泰三年五月从瑞安县分设泰顺县；成化五年二月析台州府黄岩地设置太平县；成化七年正月割金华府之金华、兰溪，衢州府龙游、处州府遂昌 4 县地新置汤溪县；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分湖州府安吉、长兴两县部分辖地新置孝丰县。以上 11 县之建置被完整地沿袭至清代，而明代各县辖境也十分明确地构成清代各县的界域基础，包括其四至八到之界亦基本未见有变动。此处可再以清代黄岩县为例，对这一现象作进一步的分析。据《明实录》记载，成化五年十二月壬申，台州知府阮勤以地迥难治，奏请析黄岩县南三乡地分置太平县，<sup>[11]</sup>分县之后定黄岩之疆界为：

东西三百一十里，南北六十里，是为提封之境旧志南北一百四十三里。东六十里海门山入海，西二百五十里苍山入仙居县境，南五十里盘山入乐清县境旧志南九十里乔岭入乐清县境，北一十里戍铺岭即黄土岭入临海县境，是为四正之境。东南六十里新河入太平县界旧志东南二百一十五里大间入乐清界，西南三百里尘山入永嘉界，东北六十里赤山村，西北七十里义城乡皆入临海界，是为四隅之境。<sup>[12]</sup>

康熙《黄岩县志》所载与之同，乾隆《黄岩县志》中虽然对县境出现了不同的记载，但记载中涉及的四至八到的交界方位等地理事实多有失误，光绪《黄岩县志》对此一一指出并详加考订：

黄岩与临海、仙居、永嘉、乐清、太平接壤，东南界太平，东北界临海，志固无误。至所云西北入仙居，正西入乐清，西南至盘山，正南至凤洋汛则方位皆错。西北界临海，其山路所出者曰车口，曰上奥，曰杨畝，杨畝大道通义诚岭，上奥小径通三洲岭，车口小径通南蒋、北蒋，皆入临海，无达仙居者。自柔川二坪，茅坪五都二十余里方入仙居，乃正西也。又自乌岩而宁溪而半岭而决要，乃入永嘉界，则西而迤南矣。与乐清相接者，则西南非正西也。一自小坑至御营，一自沙埠至太湖，一至柏奥至盘山，盘山黄岩之正南，御营、太湖皆黄岩之西南，凤洋汛在石曲以下，邑之东南非正南也。此志之当改正者也。<sup>[13] 41</sup>

可见，黄岩县自析出县南三乡二十一都后，与其交界之县便多出县境之东南的太平县，即共与仙居、乐清、临海、太平、永嘉等 5 县交界。及至清代，黄岩县的全部界段分布与此基本相同，只是部分志书对县境记载的界点以及交界方位出现了不够准确的地方，而经过校正之后的黄岩县境，被厘定为：

县在郡东南六十里，东西二百八十里，南北六十里，是为提封之境。东三十里栅桥入临海界，西两百五十里苍山入仙居界，南五十里盘山入乐清界，北一十里戍铺岭入临海界，是为四正之境，东南六十里金清港入太平界，西南三百里尘山入永嘉县界，东北二十里三港口，西北五十里义诚岭俱入临海界，是为四隅之境。<sup>[13] 42</sup>

对比前述明代析出太平县地后的黄岩县境记载，发现黄岩县于成化之后至于整个清代的幅员、辖境基本没有大的变化，5 条界段构成的县界维持稳定的状态，各界段所依附的显著界点前后大体一致，由之连缀而成的具体边界走向也一直较为完整地沿袭。

与此同时，浙江省界邻的区域内所出现的多次政区调整，其中出于政治控制、赋税征收等目的的政区之间的分疆划界占据了主流，各级政区及其各要素的变动之频率显然高于本省，政区整顿手段也显得较为多元，具体形式比浙江省丰富。不过彼此之间也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现象，如这一区域内的边界管理方面，更多的是表现为对边界地区尤其是疆界错壤地带，派驻分防机构如巡检司、通判、同知，以消弭盗匪动乱而控驭地方。<sup>[14]</sup>从政区建置的角度而言，即通过新增或调配行政建制，来强化边界的边缘区、敏感区域的政治力量，重建社会秩序，以实现疆界管理的目的。

有清一代，朝廷与地方的行政管理中，除却维持治安这一首要职责以外，最重要的是征税和司法，即官方关注的焦点在于刑名、钱粮等司法、经济、民事等事务。各项具体的行政运作所追求的目标是稳定的政治控制与社会防护，政区界线一旦由朝廷与地方官员主导下被人为地划定，所对应的“疆界”便成为朝廷施政的重要空间基础，所谓“疆界正，田禄定，然后可以设治，此疆域所昉也”，<sup>[15]</sup>“疆域之宜分也，以经界之宜正也。经界之宜正，以地亩宜清而赋税宜均也。分疆域，正经界，而民之

不田而粮，不粮而田者少矣，养民之务，孰急于此”。<sup>[16]</sup> 除非因州县界址交错不清，地方管辖中出现了互相推诿扯皮，从而导致较为重大的政治隐患或社会矛盾，一般朝廷对各府、厅、州县的具体界址的态度是一旦划定便注重“久远得以遵据”，<sup>[21] 457</sup> 以维持传统境界。从有关政区边界的文献梳理情况来看，清代浙江省境内源于界线两侧（如界邻的县之间、界邻的府之间）的地方文献有关界点及界线划定的记载很少有矛盾之处，同时亦罕有两个政区之间因界邻区域的归属产生争议，虽然其中也会反映一些由政府主导下对界线本身的勘划与厘定以解决界域纠纷的情况，如光绪《开化县志》记载雍正三年（1725）奉旨新勘疆域分界，各处俱立有界碑；<sup>[17]</sup> 光绪《永康县志》记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知县沈藻即奉督宪之命勘准县境界址，<sup>[18]</sup> 以及雍正《浙江通志》等文献，记录江、浙两省因军事分防而引起的今嵊泗列岛一带的海上划界。<sup>[19]</sup> 但这一类的事例十分少见。由此可见，朝廷对政区边界地带的控制表现出一定的散漫性。一般只有在触及政区重新划分时或者边界地带发生不可控的治安事态使得中心地域遭受威胁之时，疆界问题才会进入官方的视野从而赋以正式的关注，文献之于直接的勘界、分界等事宜记载也表现出一定的“忽视”。

若追究清代浙江省各级政区边界所表现出的继承性与稳定性之成因，笔者以为可以多角度进行探索，其中政治因素在地理空间拓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学者研究指出，基于传统国家赋税收入与支出的平衡理念与强调收支相抵的财政政策，清代国家的赋税制度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定额化”倾向，赋税制度的“定额”也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包括改隶州县、添设官员等在内国家行政支出的扩张规模。在传统国家追求赋税定额与政区稳定的背景下，因清代浙江省的各级政区体系在地域管辖方面属于“疆域广狭布置适宜”“控制既已得宜”，<sup>[20]</sup> 故其辖地改属、析置政区等行政区划调整也就显得不太必要。只是考虑到如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近海岛屿等特殊地域的日渐开发成熟，以及军事战略上的地缘重要性等，朝廷由此采取了政区等级的升格或直隶厅或散厅之建置等政区调整策略，以适应地方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从而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这样旨在“维稳”的行政理念，以及凸显“继承关系”的制度背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传统国家在各级政区疆界管理中的策略倾向，即本着地方秩序稳定的意图，为规避直接的辖境调整，特别是官方勘界等所带来的较为高昂的行政成本，朝廷更多地倾向于对传统境界的维持，或尽力寻求其他替代性举措（如通过地方府州县之间的跨界合作等方式），以解决界邻区域的政治控制问题。

## 二、政区边界空间类型及其特征分析

为正经界、区分疆域而划定的各级政区界线不会停留于人为的意识层面，通过具体的一系列政治运作，它势必落实于现实的地表，并依附于特定的地物要素，以呈现出某种确定的地理形态。界线坐落于地表，即表现出对地物要素的选择，而这一选择既是一个时间过程，也是一个空间过程，其内在的驱动力，除却基于特定的政治合理性的考量，还来自于由地貌、地形等条件所构建的空间地理背景的支撑。由于浙江省辖境内较为显著的自然地理条件，故各级政区界线通过历史时期不断的“边界积累”以及调适过程，及至清代已开始凸显出较为成熟的空间地理特征。

以界线的地理形态而论，浙江省各级政区界线的类型，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 4 种情形：以海（海岛或洋面）为界；以山（山岭或山系）为界；以水（江、河、湖、溪、塘、荡等水系支流）为界；以普通聚落点（村庄、市镇等）为界。

### （一）以海为界

“以海为界”即是以海岛、洋面为界。在浙江省 12 个统县政区内，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嘉兴府、绍兴府、宁波府、台州府、温州府、定海直隶厅及其所辖之部分滨海县级政区中。因其部分辖境由陆地延伸至海上，近海洋面以及错落的大小岛屿成为政区之间划定疆界时所必须面对的重要方面。典型的案例，如江、浙两省之间关于今嵊泗列岛的勘界与划界，定海直隶厅与宁波府（镇海、象山、慈溪）之海界，温州府玉环厅、乐清县、永嘉县、台州府太平县之海界，以及温州府瑞安、平阳两县海界，宁波府象山与台州府临海两县之界等。以上界线不论是高层政区界线、统县政区的界线还是作为基层政区界线的县界，都无一例外涉及以海岛为界点的近海洋面之划分。同时，比起陆上湖泊的盈缩、河道的迁徙、滩涂的涨退、林地的消长等，近海洋面以及海岛具有一定程度的“非流动性”。除非大面积的海水涨潮，引发岛屿的湮没或者板块运动引起的并海成陆等，作为地

标的洋面与海岛自身作为地理实体不会发生过于剧烈的地理变迁，一旦被人为地确定为地方辖境的分界，其所具备的较为强烈的权属特性不会轻易发生改变（如宁波、台州二府交界之“台明屿”）。不过，传统社会对海洋地理认识毕竟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以洋面或海岛为界的意识并不能表现出十分精确的意义。有些文献记载包括舆图资料都会反映出对近海之界记载的一定程度的模棱两可，乃至文字资料与舆图所绘的彼此矛盾。最为突出的一点便存在于，作为分界点的洋面或岛屿，很多人烟罕至，虽历史时期有沿海居民的垦殖，但总体开发仍然不足。对于官方而言，对海岛的分划拨转在巡查缉私等方面所显示的海防军事意义，要超过基于刑名、钱粮的行政管辖意义。同时，岛屿作关键分界点的自身归属分析往往也颇费周折，如下文有关省界研究中的清代浙江东北海中的大洋山、小洋山、马蹟岛、陈钱山等若干山岛（即今嵊泗列岛），其作为省之界线无疑，然单凭文献对于界线的记叙，仍不能十分明确断定界线走向与这些岛屿的关系。具体的研究包括边界绘图中只有通过反复梳理文献记载（文字、舆图等），借助岛屿的权属分析，以判断“界岛”的不同情形，即岛归甲属（或乙属），界在岛外；界穿岛而过，岛为甲、乙之共属，从而划定边界的完整走向。

## （二）以山为界

“以山为界”之意，即指每两政区之间以山岭或者山系等为划界的标志性地物，从而使得界线的布局取得符合天然形势的便利。以浙江全境来看，“以山(岭)为界”的现象，在包括衢州府、严州府、处州府以及杭州府西部、湖州府西部等地所处的浙西地域以及温州府西部(与福建福宁府交界)表现得十分明显。笔者在复原政区边界、考订各级界点之时，入选的显著界点很大一部分即是坐落于边界之上的山、峰、岭或者山系，而这一特点鲜明的界线空间布局与浙江省境内的山系分布息息相关。如天目山、昱岭、仙霞岭、枫岭、雁荡山、括苍山、天台山、会稽山、四明山等多处山脉，呈现“西南—东北”走向贯穿于全省境内，<sup>[21]</sup>这些主要山脉的布局为省内统县政区级及其省际的高层政区界线的划定提供了重要地理依据，如浙江与安徽、江西两省之界，即在以山为界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据笔者统计，光绪年间《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之《浙江省图》中标绘出与安徽广德、宁国、绩溪、歙县、休宁、婺源，江西德兴、玉山、广丰，福建浦城、松溪、政和、寿宁、福安、霞浦、福鼎 16 州县之界，即 16 个县级政区界段之上明确为界点的 53 例，其中以山或岭为界者有 34 例，占到总数的 64. 1%，其余的界点有 18 个为关隘，1 处为双港溪(以河为界，浙江温州府、福建福宁府之界，其余穿界而过却不以河段为界的支流，此处不计为界点)，而一般关隘皆设置在险要的山岭之上(如孔夫关、白沙关、昱岭关、分水关等)，故以关隘为界可视作由以山岭为界衍生出的一种边界现象。这一分界情形在光绪三十四年所成的《大清帝国全图》之《浙江省图》中也有极为相似的反映，该图中在与安徽、江西、福建三省 7 个统县政区交界的 7 个统县政区界段的界线上，明确标绘出(依逆时针方向):青岷山、马头山、东虎山、佛岭、董岭关、将军山、孔夫关、黄苕山、莲花峰、西天目山、石柱关、白沙关、黄花关、阳干岭、绩岭、昱岭关、汪岭、银山、金玉山、万岁岭、小莲岭、大莲岭、遥坞、鸡曲岭、际岭关、西华山、鹿洞山、白沙关、槐荫山、双凤山、云雷山、大尖山、浮盖山、白岩山、泉山、横坑山、黄沙隘、官山、黄阮隘、富源山、文山、青田隘、青草隘、双港溪、天分隘、墩头隘、叠石关、西关、分水关等共 49 个界点，其中为山岭及山系者共 30 个，占到总数约 61. 2%(若计入关隘的 17 处，则比例将升至 95. 9%)。这里的简要统计、分析，便足以反映一个传统政区边界的事实，即山岭或山系以及衍生而出的关隘等皆构成了浙江省界中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山岭、山系又无不成为两省水系的重要分水岭，如衢州府境“西邻江西，山势连绵，南走闽省，其形如脊，脊西水皆入江西，不入浙省，脊东水皆归浙江不入江省，唯南北各有一水，贯通两省，流亦不长”。<sup>[22]</sup>

同时，以山岭或山系为界在统县政区的界线方面也有较为显著的反映。如宁、绍二府之界，四明山系便为重要的天然分界标志。衢州府、处州府以仙霞岭为界，杭州府、湖州府以天目山系为界。台州、处州二府以括苍山系为界，“括苍峙临海、仙居二县间，绵延及于处州之缙云、丽水，址跨两郡，雄秀阻深”。<sup>[23]</sup>大盆山(即大盘山)系构成台州、金华二府境之水的分水岭，“始丰溪出其东北，画溪出其西北，九曲溪出其西南，其东南又出诸小溪入永安溪”，<sup>[24]</sup>由此该山系也就为二府分界的重要地标。至于微观尺度下基层政区界线方面“以山岭为界”的现象，则更为普遍，此处仅举两例:如宁波府奉化县北部与鄞县之界，据宣统二年《宁波府图》所标绘的界线之上的显著界点，统计后共有:岩顶山、四明山、西山、鄞江、茅山、走马塘市、马岭、金峨山、分水冈、道陈岭、虾爬山 11 个，其中山岭占据 9 个，占比约 81. 2%。另如青田县西南部与景宁县界，其界线之上的显著界点有:后山坳、青草尖、笔排尖、寮坑坳、笃州尖、大茂尖、九曲峰、浅杨坳、十八欠坳、上山岭顶、上岳山、下金山、界山、马首尖、坪后山、朱竹山、箬桐隘(有界碑)、石佛山、盖花红山、胡岸岭顶、湖头山，合计 21 个，其中山、岭有 16 个，占比 76. 1%。

由此可见，清代浙江省各级政区界线中，介入山岭因素的布局特点广泛而显著。

### (三) 以水为界

“以江、河、湖、溪、塘、荡等水系支流为界”的分界现象，则主要在浙西杭、嘉、湖三府地区表现明显。所谓“浙西杭州半山半水，湖州亦然，嘉兴水多山少，实为泽国”，<sup>[25]</sup>杭嘉湖之民则概称“泽国之民”。<sup>[26]</sup>因为水系网状发育，支流繁茂且纵横交错，其间“环江带湖，纵为浦，横为塘，其支流所在，为港、为泾、为荡、为浜、为壤、为淹、为溇，随地异名”，<sup>[27]</sup>故政区边界因复杂的水系格局而交错分布的情形极为普遍。以江、河、湖、荡、漾、溇等水体为交界的例子屡见不鲜，诸如“浙江一名浙江，自桐庐东北来，迳富阳县为富春江，东北流至算账岭入县西南境，东经渔山埠，江心有涨沙曰铜盆沙，又东迤北迳县南入仁和界，南岸界萧山”。<sup>[28]</sup><sup>258</sup>绍兴府境内的西小江一名钱清江，出萧山县南临浦镇，“东北屈曲流，又折东南穿运河而东入山阴界，自发源至此，皆与山阴分水”。<sup>[28]</sup><sup>270</sup>

“太湖在(乌程)城北，西北与长兴县接壤，东北与江南吴县接壤，东与江南震泽县接壤，水面以小雷山为界”，<sup>[29]</sup><sup>567</sup>嘉兴县之“东南一里有南湖，接秀水县界”，<sup>[28]</sup><sup>261</sup>县境之北由境内水系所潴的南官、北官、连四、梅家、陆家诸荡，俱入江苏吴江。<sup>[28]</sup><sup>261</sup>嘉善县境之汾湖“在县西北三十五里，北接江苏吴江界”，<sup>[28]</sup><sup>262</sup>其境内“祥符荡在嘉善县西南二十里，与秀水县接壤”，<sup>[30]</sup>“其北沈家、白鱼、上白诸荡，西北有乌盆潭、木斜湖、吴家漾，并接江苏青浦界”。<sup>[28]</sup><sup>262</sup>湖州府归安县境内有钱山漾，漾之西为乌程界，县境之南有洛舍漾，其东南德清界，西南武康界。<sup>[31]</sup>

另如长水塘在嘉兴县南三里，“源出海宁州硤石诸山，流经桐乡县东南，又东北入嘉兴县界。东接练浦塘，又东北合秀水县鸳鸯湖东派及海盐塘诸水，会为滂湖。稍北而东折出会龙桥，水分两派，一为汉塘，东入平湖县界；一为华亭塘，东北入嘉善县界”，<sup>[30]</sup>一条支流南北纵贯海宁、桐乡、海盐、嘉兴、秀水、平湖、嘉善 7 州县，“长水塘自海宁、海盐缘东南界入海盐、嘉兴为界水”。<sup>[32]</sup><sup>2132</sup>北沙渚塘、中沙渚塘、南沙渚塘接运河之水，流经石门、桐乡两县之界，是为东西向的三条平行的支流，其中南沙渚塘入海宁、桐乡为界水，<sup>[32]</sup><sup>2132</sup>秀水县境内之烂溪，“西北自桐乡入，入震泽、吴江为界水”。<sup>[32]</sup><sup>2131</sup>

因浙北诸多支流小水汇流以后，皆向北注入太湖，太湖南缘遂逐渐形成一系列的溇港，而这些溇港也成为了分疆划界的重要地标。如“小梅港在(乌程县)城北十八里，有小梅山，山之西为埭缺港石塘，属长兴界”，自小梅港迤东，分别有“西金港一作西山港，顾家港、官渚港一作管大港、张婆港、宣家港、宿渚港、杨渚港、泥桥港、寺桥港，凡九港”。又东即大钱湖口，“自大钱迤东为计家港一作纪家港、诸溇、沈溇、安溇、罗溇、大溇、新泾溇一作新泾港、潘溇、幻河溇一作幻湖溇，一作幻溇，今称夏溇、西金溇、东金溇、许溇、杨溇、谢溇、义高溇一作义皋溇、陈溇、濮溇一作薄溇、伍浦溇、蒋溇、钱溇、新浦溇、石桥溇今称石桥浦、汤溇、晟溇一作盛溇、宋溇、乔溇、胡溇，凡二十七溇，东接江苏震泽县境，以胡溇中心分界”。<sup>[29]</sup><sup>571</sup>所谓“溇”是为诸多支流水系汇聚太湖的长期稳定的注水口，如小梅口即是乌程县境内小梅港汇入太湖处，大钱口即是苕溪流入太湖处，所以溇港也可看作是水系衍生而出的水体要素，而太湖南缘最东之胡溇(今湖州市吴兴区东北部的胡溇村滨太湖处)成为江浙两省之界。此处以“溇”为界以及前述以河、湖、塘、荡、漾等多种水体为界的现象，表明浙江北部平原一片“泽国景观”下，复杂繁密的水体要素在疆域经界的整合中，融入程度之高，以及融入形式的相对多元化。

### (四) 以普通聚落点为界

考察清代浙江省各级政区边界的空间分布特征时，“以特定聚落点为界”的分界现象自然不能被忽视。这里所强调的“特定聚落点”，主要是指坐落于界线之上的边界性市镇，它与江南区域内普遍存在的其他市镇在历史起源、经济结构、商业功能以及与乡村之间关系的特点等诸方面具有共通性，皆属于江南市镇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对象。只是这一类具有边界性质的市镇在微观的地理空间以及政治过程运作方面，鲜明地表现出“跨界”的特征，即市镇之地处于辖境边缘，为两地分界之界标，或人为划定的政区界线直接穿过了市镇区域的内部(如民居、街巷、桥梁或水网)，市镇空间被分割成属于两个甚至多个不同政区单位的部分。这样的“以市镇为界”现象在浙江省境内，尤其是杭、嘉、湖等府境之内，可以发现诸多的案例。笔者通过梳理相关

史志、舆图文献，整理出清末浙江地区所有的“边界市镇”，具体见表 2。

表 2 清末浙江省“边界市镇”一览

所属之府	镇(市)	空间归属	备注
杭州府	瓶窑镇	钱塘、余杭共管	半隶钱塘,半隶余杭
	塘栖镇	仁和、德清共管	水南属仁和,水北属德清
	长安镇	属海宁	海宁、仁和之界
	硖石镇	属海宁	海宁、秀水、桐乡之界
	寿安坊市	钱塘、仁和共管	旧名花市街,南隶钱塘,北隶仁和
	江涨桥市	钱塘、仁和共管	东市在仁和,西市在钱塘
	新行镇	属嘉兴	脉连海盐、平湖,错壤在两邑之偏隅
嘉兴府	王江泾镇	属秀水	南尽秀水界,北据吴江界
	濮院镇	嘉兴、秀水、桐乡共管	西南属桐乡,东北属秀水,东南隅又为嘉兴县所辖
	枫泾	嘉善、娄县共管	半属嘉善,半属娄县
	南浔镇	属乌程	乌程、震泽之界
湖州府	乌镇(乌青镇)	桐乡、乌程共管	运河以东属桐乡为青镇,以西属乌程曰乌镇,二镇之四栅八隅为江浙二省、湖嘉苏三府、乌程归安石门桐乡秀水吴江震泽七县错壤地
绍兴府	临浦镇	山阴、萧山共管	山阴、萧山之界
	纂风镇	属上虞	会稽、上虞之界
	钱清镇	属山阴	山阴、萧山之界
	三界镇	属嵊县	嵊县、上虞、会稽之界
金华府	永昌镇	属兰溪	兰溪、建德之界

依表 2 之梳理, 12 个边界市镇共同的特征即是“镇区”之地处于界域之边缘而毗邻他县, 或市镇自身为两县或两县以上的行政单位分辖, 从而成为界段之上不容忽视的显著之界点。市镇所跨越之界的层级则涵盖了高层政区、统县政区、县级政区等 3 个层级, 其具体的情形又较为复杂, 部分市镇地域只是涉及纯粹的县级界线, 有的则兼及基层政区、统县政区的两级界线, 有的甚至直接囊括了 3 个层级的界线, 从而在多个政区之间有着交错复杂的“空间互动”。具体如塘栖镇, “东西相距六十里, 南北相距二十五里”,<sup>[33] 33</sup> 东至语溪, 北抵德清, 西至奉口, 南向仁和, 有乔司、临平、小林连壤相错, “界仁和、德清而西南所界并及钱塘……仁和以唐榭为镇, 而德清志亦以唐榭为十都乡镇, 并及青林、句垒等村, 盖水南隶仁和, 水北隶德清”。<sup>[33] 4</sup>

濮院镇“嘉邑所属为长水乡, 秀邑所属为灵宿乡, 桐邑所属为梧桐乡, 桐邑之名由此……吾镇适为三乡之会”。<sup>[34]</sup> 南浔镇其“镇属乌程县震泽下乡十七区四十三都, 按震泽上三十五都至三十九都, 震泽下四十都至四十三都, 今浔镇为一百六十三庄至七十一庄止, 分西栅上、下塘, 东栅大桥湾、马家港, 南栅张王庙、苏鲁桥, 北栅万善庵、唐家兜各村庄……东栅外百步即震泽县地界, 东栅外有极乐庵, 西旁有分乡堽之西为柁之一圩浙江界, 堽之东为大幹字圩江苏界”。<sup>[35]</sup> 个别市镇如乌镇(一作乌青镇)则分属桐乡、乌程, 错落在 2 个高层政区、3 个统县政区、7 个基层政区交界处, 其地“为两省三郡五邑壤地相错之区, 溪经港维, 几同丝焚”,<sup>[36] 220</sup> 极尽犬牙之势, 空间地域结构更为复杂, 所谓“南栅东属桐乡, 西属乌程, 南属归安……北栅东属

桐乡，西属乌程，东北秀水、吴江交界，西北属震泽……东栅属桐乡……”。<sup>[36] 228-229</sup>与此同时，据上表分析，亦可见这一类“边界市镇”多集中分布在杭嘉湖地区即所谓传统江南地域之内，杭嘉湖以外的其他区域内数目则相对寥落(共计 5 个，占总数 17 的 29%之弱)。

### 三、余论

边界是构成政区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填充、区分地域空间与政治空间的地域要素。“行政区与经济区、自然区等各种类型的区域相比较，一个显著的特点和区别之一是行政区有明确的行政边界线”，<sup>[37]</sup>边界线内部所蕴含的界线长度、走向以及重要地表标志物诸要素，无不直接依赖于一定的地理背景，其格局之形成则有其丰富多元的空间基础。地球表面原先即存在着若干的山岭、湖泊、沼泽、海岸等自然性质的地物，其边缘性的或其他部分都可能具有地理界限的作用，并为生活居住在其周围的人群或组织所利用。<sup>[38]</sup>但边界线并非天然形成，它毕竟是基于人为因素而划定的结果，即行政主体通过对地形、地貌等地表结构的认知，借助于实现权力空间配置的政治过程对行政区域进行的分疆划界。政区界线的人为性特征，即表现在来自历史开发、制度与政治观念等方面的人文因素，深刻地作用于自边界出现之始的整个发展过程。所以，从根本上而论，边界线长度的厘定、具体走向的确定、重要地理界点的选定乃至政区边界格局的塑造及其变动，不仅离不开人为因素，而且某种程度而言，它更是根源于特定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与观念意识等诸方面所融汇而成的“人文力量”。

纵观有清一代，浙江省政区边界格局整体表现出鲜明的历史继承性与稳定性，浙江省辖境之内各级政区界线经过历史时期不断的边界积累与调适过程，及至清代已开始凸显出较为成熟的空间地理特征。以界线的地理形态而论，清代浙江省各级政区界线的空间类型，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 4 种情形：以海(海岛或洋面)、山(山岭或山系)、水(江河湖溪塘等)、普通聚落点(村庄与市镇等)为界。上述四大政区边界的空间类型，无疑是浙江空间地理基础与人为政治过程不断互动融合的结果，也构成了政区边界要素所处区域“地理特性”的象征。分析浙江省政区边界的格局构建以及空间类型，将有助于加深各级行政界线发展规律的脉絡性认识，也为今后具体地置身于历史的现场去考察各级政区在疆界管理方面的运作规律奠定较为扎实的基础。

#### 注释：

①代表成果如：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周振鹤. 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 [J]. 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 1998；周振鹤. 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J]. 历史地理，2003(19)；冯贤亮. 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9-166. 冯贤亮. 明清中国地方政府的疆界管理—以苏南、浙西地域社会的讨论为中心 [J]. 历史地理，2006(21)；徐建平. 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 [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②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曾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等机构合作，于 2001 年正式启动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CHGIS)的研究开发项目。该研究工作将制定一套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对所有能发现并能够确定的地名进行编码，进而予以数字化地显示于地图之上。截至目前，相关研究工作已发布阶段性成果，研究者借助于复旦大学禹贡网发布的 CHGIS 检索平台，可较为便利地查阅 1820 年、1911 年两个年份的全国疆域、地名、行政界线等数据演示。1820 年数据演示暂时只涵盖了高层政区界线即省界，而 1911 年数据演示则包括了全国部分省份县级行政界线。但十分遗憾的是，该项成果未能公开说明绘制的过程以及给出地图绘制的相关依据，部分界段的绘制也并未及时吸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

#### 参考文献：

[1] 周振鹤.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5.

[2] 清世宗实录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 [3] 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31.
- [4]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 [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0:448-449.
- [5] 民国南田县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99-103.
- [6] 清仁宗实录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86-87.
- [7] 光绪三十四年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M] //徐秀丽. 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04:3.
- [8] 周振鹤.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246.
- [9] 崇祯宁海县志 [M]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503 号.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3:54-56.
- [10] 光绪宁海县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3:40.
- [11] 明宪宗实录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2:1429.
- [12] 万历黄岩县志 [M]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18 册.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1982.
- [13] 光绪黄岩县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
- [14] 傅林祥. 清代地方行政制度专题研究 [D]. 上海:复旦大学, 2010:197.
- [15] 天启平湖县志 [M]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 27 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0:86.
- [16] 康熙永康县志 [M]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528 号.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3:73.
- [17] 光绪开化县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630-631.
- [18] 光绪永康县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446.
- [19] 雍正浙江通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省志辑.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0:109.
- [20]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二日刑部右侍郎杨超曾奏陈酌停直省州县之改隶佐杂之添设折 [M] //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1979:279.
- [21] 林传甲. 大中华地理志之大中华浙江地理志 [M]. 杭州:浙江印刷公司, 1918:23-39.
- [22] 光绪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之衢州府图说 [M] //王自强. 清代地图集汇编.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5:545.
- [23] 光绪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之台州府图说 [M] //王自强. 清代地图集汇编.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5:366.

- 
- [24] 光绪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之金华府图说 [M] //王自强. 清代地图集汇编.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5:447.
- [25] 光绪嘉兴府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306.
- [26] 王士性. 广志绎 [M] //吕景琳. 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元明史料笔记. 北京:中华书局, 1981:324.
- [27] 黄辅辰. 营田辑要校释 [M] //马宗申. 中国农书丛刊综合之部. 北京:农业出版社, 1984:117.
- [28] 清国史:第3册地理志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3.
- [29] 光绪乌程县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
- [30] 穆彰阿.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87浙江统部·嘉兴府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31] 光绪归安县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348.
- [32] 赵尔巽. 清史稿:卷65地理十二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6.
- [33] 光绪唐棲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
- [34] 嘉庆濮川所闻记 [M] //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223.
- [35] 道光南浔镇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822-823.
- [36] 乾隆乌青镇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
- [37] 刘君德. 中国政区地理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39.
- [38] 侯甬坚. 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 [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125.